

# 国际结构的二重性

——以二战结束初期中美关系和当前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为例

李宝田<sup>1 2</sup> 沈惠平<sup>1 3</sup>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3.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在“援蒋”的同时积极调处国共争端,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的。今天美国对台政策亦存在矛盾,其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又根据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以关切台湾安全为由售台武器。学界对此已提出诸多解释,但唯独对国际结构二重性缺乏深入研究。事实上,国际结构二重性将导致行为体间关系的二重性(内在张力),这一假说可以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和当前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进行验证。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华政策正是在美苏结构之下产生的,当前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亦深受国际结构二重性的影响。

**关键词:** 国际结构; 二重性; 中美关系; 美台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8)05-17-08

DOI:10.14157/j.cnki.twrq.2018.05.003

##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解释

二战使国际格局发生剧烈变动,人类面临巨大危机。1940年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法西斯国家谋求称霸世界。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对日宣战,紧接着美、中等26国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反法西斯联盟成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在对日受降等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国民党与美国都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日受降的合理要求与行动。不仅如此,美国还帮助国民党空运军队,助其控制日本占领区和交通线,致使已宣布投降的日军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落入国民党手中。这体现了美国当时的“扶蒋压共”政策,但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又反对中国内战且积极调处国共争端,如何解释美国这种矛盾的政策和行为呢?

一种解释认为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美国决策者担忧苏联插手中国事务,美国决策者对腐败的国民党打赢内战的能力有疑虑和战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让美国没有采取对华军事干涉的政策。<sup>[1]</sup>同时,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需要中国,所以美国有“援蒋”且调处国共矛盾的双重行为。该解释涉及了国际国内因素,是一种全面性解释。其实不论是美国的对欧政策,还是对亚政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JJDGAT003)

作者简介:李宝田,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所硕士研究生;

沈惠平,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策,背后都有阻遏苏联扩张的意图,因此更应从美苏两极结构的背景下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一书认为:战后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支配地位”,为阻止苏联在亚洲东北部的扩张并限制亚洲革命的影响,就需要亲美的中国来加强和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国共矛盾激化不利于美国亚洲利益的实现,而且还影响美苏在远东的关系。国民党政府软弱腐败,美国对其直接援助力不从心,因此,罗斯福试图调处国共争端,以促成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使中国在战后能够按美国的需要在远东发挥作用。<sup>[2]</sup>该解释接近以美苏结构解释美国对华政策,但又以党派、国内政治因素解释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行为。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面对苏联扩张势头和中苏矛盾,中美两国逐步实现高层接触并正式建交,双方先后签署了三个联合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而在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即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这违反了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因此美国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

中美关系正常化几乎是和美国对台湾问题由“介入”向有条件的“不介入”的转变及美国在亚洲力量的收缩同步进行的。这种调整受几个因素的制约:(1)美国与台湾交往的历史和在台湾地区的经济、政治、战略上的利益,使它不愿意彻底割断与台当局的关系;(2)美国认为它对亚太地区承担的义务和对盟国所做出的许诺,使它不愿彻底割断与台当局的关系;(3)美国国内传统反共势力和国会亲台力量阻碍美国彻底割断与台当局的关系。<sup>[3]</sup>另一方面,美国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力量强调加强和中国的联系符合美国利益,有利于遏阻苏联扩张和亚太稳定。<sup>[4]</sup>对美国“双轨政策”的这种解释,是从中美关系、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分别阐述的,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双轨政策”的产生。也有学者指出美国“改造中国”使命等价值观念对其“双轨政策”的影响,<sup>[5]</sup>这是对美国对华政策意涵的有益补充。当前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使得美国“双轨政策”具有与以往不同的背景和环境,但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依然处于中美结构的作用之下,下文第二个案例即探讨当前国际结构对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作用。

本文不否认国内及个人因素对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影响,但国家对外战略与政策是以国际形势为基础的。如美国学者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所指出的,“应该强调的是,理论的首要目标是解释;当描述性要求和解释性要求相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具有优先地位,即使这是以牺牲某些描述上的准确为代价的。”<sup>[6]</sup>针对上述两个相似的存在内在张力的美国对华/对台政策,本文抽象出国际结构这一核心变量,尝试从这一概念出发,提出国际结构二重性产生行为体间关系的二重性(内在张力)的假说,并以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和当前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对该假说进行论证。

## 二、理论框架

### (一) 国际结构及外、内层结构的划分

国际结构这一“核心概念”来源于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沃尔兹从三个方面来界定结构的概念。首先,结构是根据系统排列所依据的原则界定的。如果一种排列原则代替了另一种排列原则,那么系统就发生了改变。其次,结构是根据不同单元的功能来界定的。如果功能有了不同的定义和分配,那么系统就发生了改变,这主要指国内政治结构。无政府的国际社会是由同类单元组成的,功能上并不存在分工,结构也就没有变化。最后,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力量的分配来界定的。无论等级制还是无政府状态的系统,能力分配的变化都是系统的变化。<sup>[7]</sup>本文大体沿用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的界定,但主要是指特定行为体之间根据能力分配形成的结构。此处的行

为体能力是指其物质实力, 主要指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行为体实力的不平衡发展会产生不同等级结构, 因此国际结构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第一实力等级行为体之间形成的结构, 这里称之为外层结构, 如冷战时期美苏的两极结构; 二是低实力等级行为体和外层结构中的行为体之间形成的结构, 称之为内层结构, 如 1949 年的中苏和中美形成内层结构。外层结构和内层结构的关系见下文的理论假说。

## (二) 国际结构的二重性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预设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此为各行为体自主行为的前提条件, 且各行为体以谋求自身安全和利益为目标。这里同时把国际结构内存在“竞争文化”作为分析的前提之一, 尤其外层结构的行为体之间视对方为竞争对手, 从而展开竞争性互动, 如霸权国认为崛起国挑战了其领导地位而相互竞争。

国际结构由特定行为体根据物质实力的分配而构成。有目的行为体在做行动选择的时候把其他行为体考虑进来, 就产生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sup>[8]</sup> 外层结构对其中的行为体产生以下两方面的作用即为国际结构的二重性:

1. 激励性: 外层结构对其中行为体的战略目标、政策和行为选择的刺激作用。在国际上各国各地区尤其外层结构中的大国, 有相当实力基础, 又有竞争观念, 为了让自身战略上更加安全、政治上地位更高、经济上更加繁荣, 不断努力提升综合实力。除了行为体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外, 改变行为体间战略关系也是提升自身实力进而提升国际地位并获得更多利益的有效策略。这种战略关系的建立主要是由结构所激励的, 外交家的意志是次要方面。在外层结构作用下, 主要行为体的决策者会预测其他行为体的行动选择, 调整国家或地区间战略关系, 以利于自身实力和利益的增加, 利于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如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高层交流并建交, 很大程度是国际结构的激励作用。当时在中苏交恶的情况下, 美苏结构推动中美走到了一起, 符合中美两国利益。

2. 制约性: 即外层结构对其中行为体的战略目标、政策和行为有约束作用。主要大国的战略与政策会受到现实条件、其他行为体尤其是大国反应的制约。以国际结构为战略制定的出发点, 当然也就承认了结构的制约作用。国际结构为大国之“理性”限定了框架, 即大国的“理性”是有前提加以约束的。重要的一点是, 理性的行为体决策者在制定和执行某一政策时, 会把其他行动者当作不可控的环境因素, 因此其决策及行为以不损害结构中另一大国的战略利益为底线, 以维持大国间“竞争”而非“对抗”的关系, 也就是外层结构决定着大国的政策和行为的许可范围。比如面对美国的激烈反应, 苏联最终撤走了古巴的导弹, 以防与美直接冲突。

3. 激励性和制约性的关系。不论是激励性还是制约性, 都承认外层结构的作用。激励性和制约性其实是一体之两面, 外层结构激励作用下大国实施的战略亦受其制约, 大国受到外层结构制约而行动时也即意味着结构起了激励作用, 二者是统一的。换言之, 正因为外层结构激励性和制约性的共同作用, 行为体对外政策会表现出二重性。与此同时, 各行为体争取自身最大利益是有一定限度的, 否则, 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性互动就会变成对抗性互动, 外层结构的二重性就失效了。

## (三) 理论假设

1. 如图 1 所示, 对于三个行为体 A、B、C 组成的特定结构, 只考虑各行为体的能力, 忽略其他属性。其中 A、C 两个行为体实力比 B 高一个层次, 组成外层结构(AC), B 与 A、C 分别组成内层结构(AB、BC)。当然, A、C 间实力并不均等, 只是相对 B 而言, A 与 C 实力差距最小。

基本假设: A、C 均认定行为体 B 涉及自身战略利益, 行为体 B 亦有其利益选择, 但主要是配合 A(或 C) 的战略与政策来获取自身利益。

分析对象: 根据上述外层结构的作用, B 会加入到 A、C 两个行为体关系里面, 分析内容就主要涉及三者

在结构作用下的关系。假设 A(如下文两个案例中的美国) 的实力最强, AC 外层结构作用下, A 的能动性

强于 C, C 更多是一种对 A 的回应, 所以后文以 AC 二重性为解释项, AB 关系二重性为被解释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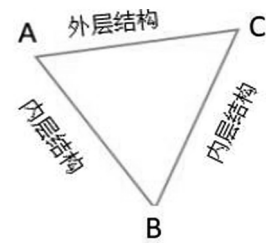


图1 行为体组成的结构

2.核心问题和理论假说

沃尔兹笔下的国际结构是各大国能力的排列, 这样一种定义有利于理论的简约性和解释力, 但仅描绘了一种静态的图景。为了解释行为体间关系, 需要中间机制。下面从国际结构这一变量出发, 以国际结构的二重性来解释大国外交政策。

本文核心问题: 外层结构 AC 对行为体 A 与行为体 B(内层结构) 之间的关系起什么作用?

根据以上内容和基本假设, 提出假说如下: 外层结构 AC 的二重性(激励性和制约性) 决定了内层结构 A 与 B 互动关系的二重性(内在矛盾性), 它们组成了国际结构的二重性。

需要指出的是, 外层结构的激励性和制约性同时起作用的条件是 A、B、C 三方处于一个较稳定的状态, 比如没有发生战争和法理地位的变化。否则, 战争爆发或法理地位改变之后, 激励性和制约性不再起作用。后文两个案例分析均以此为前提。

综上所述, 国际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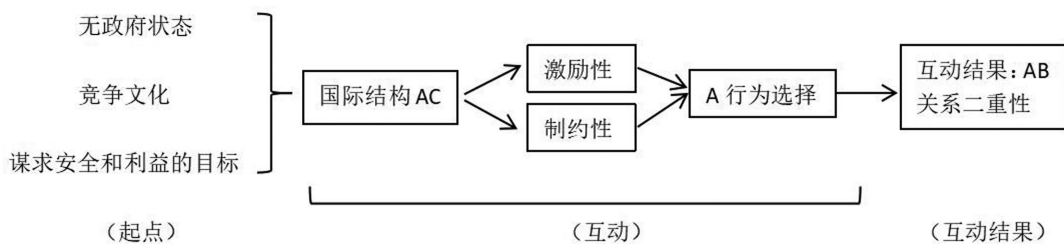


图2 国际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

### 三、二战结束初期美苏结构下的中美关系

早在二战结束前, 美苏就在讨论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二战使国际实力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欧洲主要大国综合国力急剧削弱, 以致丧失昔日主宰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地位。而美国却在战争中迅速发展, 成为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超级强国。苏联虽然在战争中损失巨大, 但依其总体实力仍然是欧亚大陆强国。以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和 1945 年的雅尔塔会议为标志, 美国逐渐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并开始向全球扩张。<sup>[9]</sup> 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安排战后秩序, 签署了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但战争一结束, 美苏用非战争手段在欧亚争夺广大中间地带, 双方互信渐失。在东欧和东北亚, 美苏开始战略竞争, 直至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

早在 1943 年 8 月魁北克会议上, 罗斯福已经明确地倾向于创造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 美、英、苏、中四大国应当在其中享有优势发言权。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 美国这样象征性地提高中国地位有利于鼓励中国抗战, 缓解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受到的日军压力。同时, 在当时中国国力和中美同盟关系的条件下, 罗斯福所设想的中国之大国地位是为了维护战后美国在亚太的优势地位。

然而,雅尔塔协议标志着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相互保持一定均衡,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说明中国地位离罗斯福口头所说相距甚远,中国不处于和美苏同等的实力级别。换言之,二战结束初期中美虽形成了“大三角”结构,但中国的实力弱于美苏,美苏外层结构的二重性决定了美蒋关系的二重性。

1. 在战后国共对立的背景下,美苏在东北亚战略竞争,促使美国延续了援蒋政策。战后西方国家不甘心让东欧国家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力图改变现状;同时对其他地方又力图维持现状,深怕苏联的影响渗入。苏联的传统安全观是扩大自身影响而建立缓冲地带,由此美苏间虽不愿爆发战争冲突,但矛盾不可调和。1946年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发给美国国务院的8千字电报为美国的“遏制”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伴随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相继出台,美国最终确立对苏联实行“遏制”战略。

战后初期蒋介石政府仍延续战时亲美的政策,如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希望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军队,美国也认为可以通过战时的结盟关系发展在华势力,战后中国的重建又离不开美国,这样,美国既需要也可能把中国保持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当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时,中国则应成为抵制这种扩张的缓冲地带。在罗斯福谋求“领导”世界的构想中,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不可缺少的。作为美国的盟国,中国可以对付其他大国:苏联、英国和东山再起的日本。因此罗斯福认为中美紧密合作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sup>[10]</sup>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援蒋政策。同时,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共是苏联扩张的工具,美国国家利益无法在共产党中国得到发展。如魏德迈在1945年11月20日的备忘录中说中国是“苏俄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的角逐场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将使中国成为苏俄的一个傀儡国家,一旦如此,苏俄将实际上控制欧亚两洲”。<sup>[11]</sup>美国根本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认为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才有助于实现美国的安全与利益,因而二战刚结束美国政府即公开支持蒋介石。1945年8月15日盟军司令部发出《一号通令》,要中国战区(除“满洲”外)的日本海陆空必须向蒋介石投降,并助蒋空运部队,让美军占领部分沿海要地。<sup>[12]</sup>21日杜鲁门宣布继续给中国运送租借物资,来年又两次延长对华租借援助期限。《租借法案》本意是美国租借物资以支援盟国抗击法西斯,二战结束后美国宣布停止向一切国家运送租借物资,只有中国例外,且租借物资中绝大多数为军事援助。物资加上美国军事顾问团,有利于提升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此外,在美国的积极鼓动下,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

由上可见,亲美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美国采取“援蒋压共”的政策,以遏制苏联在东北亚的扩张,并减弱苏联对中共的支持。美国采取这一政策的背后是美苏结构的激励作用,援蒋与美国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有相似的意涵。

2. 美苏结构对美国有制约作用。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但面对战后国共对立的现实,美国反对国共内战,并让赫尔利和马歇尔先后来华调处国共矛盾。1945年杜鲁门明确告诉回国述职的赫尔利和魏德迈,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但不能为蒋卷入中国内战。美国希望维持雅尔塔体制,尤其不想为中国问题导致美苏冲突。他们担心,一旦中国爆发内战,“将招致外国的干涉”,即苏联的干涉,中国内战将为苏联扩大在华影响提供机会。<sup>[13]</sup>在这种认知下,美国自然优先考虑国共谈判,以有利于蒋介石的统治。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美苏落实雅尔塔协议的重要一步,国民党用国家利益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最后中、美、苏三方居然都对条约表示满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利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美国自然希望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赫尔利调处后期,国共谈判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双方冲突不断,内战火药味越来越浓。美国政府派马歇尔继续调处国共矛盾,马歇尔被杜鲁门称为“最伟大的活着的美国人”,可见美国的确不希望因国

共内战而把美苏牵扯进来。两次调处的性质均是让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换取共产党“缴枪入阁”,取消独立的军队和政府,从而把中共联合、统一到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之中,不战而降中共。<sup>[14]</sup>蒋介石虽主张武力消灭中共,与马歇尔为调处国共关系而扩大国民政府基础等主张有分歧,但迫于美援等的影响力,国民党基本接受美国的调处而与中共谈判,国共还是能达成一些关键协议。由此可见,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并不期望国共冲突,以免苏联干涉,并积极调处国共矛盾,以图用“溶共”的策略来实现蒋介石治下中国的统一,显示了美苏结构对美国在华势力扩张的制约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美苏结构对美蒋关系起决定作用,且结构的二重性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援蒋”与“调处国共矛盾”的二重性,证实了上述国际结构二重性假说的有效性。

#### 四、当前美台关系分析

中美两国建交之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则声称严格遵守“与台湾关系法”,反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单独改变现状。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自相矛盾的,换句话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双轨政策”。<sup>[15]</sup>在多数情况下,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谨慎和避免过度卷入的政策,这是因为美国的对台政策从属于对华政策,其任何调整既要有利于牵制中国,又以不从根本上损害对华关系为限度。但美国始终没有改变介入与干涉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已在东亚地区展开战略竞争。“中国崛起不仅将使东亚拥有了能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而且将使东亚成为世界主要的战略竞争地区。……美国的战略重心将从中东向东亚转移,进一步印证了新的世界中心将是东亚而不是欧洲。如果东亚成为世界中心,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就不可避免地将防范中国作为首要任务,其全球战略必然是把中心地区的战略竞争作为首要考虑。”<sup>[16]</sup>2018年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作对手国家(rival powers),认为中俄“挑战美国的权势、影响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至少在东亚,中国已真正成为美国人认为的“战略竞争者”。同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主政台湾,他们都保持亲美的态度和政策,意在借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两岸间实力的巨大差距。民进党当局更是不承认“九二共识”,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台湾问题就成为美国手中的“筹码”,在与美国设计的亚太安全格局的“链接”方面,包括在“平衡”美中关系方面,其利用价值大大增加了。

在中国大陆、美国、台湾地区三方关系中,中美结构的二重性决定了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二重性。

1. 中美结构促使美国支持台湾当局。美国认为,如果不及早对中国加以牵制,而让中国在本世纪中叶或更短时间里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也是台湾当局积极争取和乐见其成的。面对两岸的现实状态,在中美结构的激励作用下,台湾问题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台湾问题是美国胁迫中国获取战略利益最廉价的工具,因此,美方将台湾作为棋子向中国大陆施压的意图和手段不会停止。”<sup>[17]</sup>近年来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军事合作取得进展,军事人员交流层级提高,继续对台军售。2017年5月底6月初,台湾海军陆战队赴夏威夷与美军混合训练,这是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来的第一次。随后,特朗普总统批准了对台出售14亿美元武器。2017年底至2018年初,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与台湾交往法”(Taiwan Travel Act),要求美国政府“鼓励美台所

有级别官员的互访交流”。2018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正式生效。8月,特朗普总统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支持强化台湾方面军力,以对抗中国大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美国近期的所作所为均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美结构的激励作用使美国重新认识到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战略意义,美国通过强化美国与台湾地区之间的实质关系或者变相支持“台独”势力或给台当局错误信号,不仅从售台武器中获利,而且可牵制中国东南地区军事力量,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耗费更多资源,牵制中国的发展速度。

2.中美结构对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产生制约作用。不被拖入台海地区潜在的军事冲突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和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依美国惯有的遏阻战争的均势思维,会使美国努力避免因台湾“分离主义”而陷入中美战争之中,因此美国不支持“法理台独”。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及在东亚甚至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活动越来越多,中美重大共同利益内涵更加多元。双方已认同的共同利益既包括共同应对外部威胁和压力,也包括各自国家的发展需要;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也包括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同利益内涵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利益及其影响的长久性和稳定性。<sup>[18]</sup>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台湾当局企图依靠美国获取国际空间无异于缘木求鱼。台湾方面虽然不乐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对美国也只能顺从,不采取激进的可能改变两岸现状的政策措施,同时也乐见美国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加强与美的实质关系。由此可见,中美结构的制约下,美国不会允许台湾当局采取激进“台独”的政策,也无力改变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美国看来,其对华的“一个中国”政策包括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关系法”创立之初的意图或许并非是牵制将来的中国,但目前该法案越来越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工具;随着“与台湾交往法”的生效,美国将根据此法案加强美国与台湾地区之间的实质关系。但与此同时,不论是法理上还是事实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的底线,美国不会也不允许台湾挑战这一底线。美国此所谓“一中”政策,内在含有矛盾性,中美结构的二重性可以较好地解释当前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二重性。

## 五、结论与不足

通过区分“三角结构”的外、内双层结构,本文证实了外层结构AC的二重性决定了内层结构行为体A、B关系的二重性。二战结束初期美苏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处于美苏结构之中,此结构产生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二重性。换言之,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受到外层结构的作用,其政策的内在矛盾性导致了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说明虽然国际结构有二重性,但激励性和制约性并非发挥同等效力。当今中美结构之中,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也有其二重性。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三方来说,中方客观上对美方霸权地位的挑战强化了美方与台湾当局的合作尤其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此激励作用或许强于中美结构对美国的制约作用。在中美实力结构暂未发生质的变化、台湾当局之法理地位未变的情况下,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这种二重性将继续存在下去。

在回答文章开头所提问题时,本文认为国际结构所起的作用更重要,因此较简洁地以国际结构的二重性这一理论框架来解释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及当前美国对台政策的矛盾性,而避免了以往较繁杂的国内政治、政党和国际等因素的解释,这是本文的理论价值所在。另一方面,为了

预测三方行为体在结构作用下的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激励性和制约性的不同效力。鉴于A的实力和能动性更强,本文只涉及了A在结构作用下与B的关系,未涉及C在结构作用下与B的关系。这两点为本文的不足之处,有待后续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 [1][9][12]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9页,第766-767页,第58页。
- [2] 章百家《美国对华政策新解——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 [3][4] 资中筠、何迪主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7-208页,第208页。
- [5][15] 沈惠平《试析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双轨政策”》,《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4期。
- [6] J.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14, No.1, Oct., 1961 p. 79.
- [7]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 [8]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7页。
- [10][11][13][14]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修订本)》(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0页,第294页,第294-295页,第300-302页。
- [16]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
- [17] 《盛九元答中评:对美需精准两手准备》,中评社香港2018年1月20日电, <http://www.crntt.com/crm-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32&docid=104948372>, 查询时间:2018年4月20日。
- [18] 郭震远《台湾问题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文生)

## The D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 Current US-Taiwan Relations  
Li Baotian, Shen Huipi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actively mediated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le “aiding Chiang”, which, on the surface, seems contradictory. Today, its policy towards Taiwan also proves to be contradictory as it claims to adhere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while, under its so-called “Taiwan Relations Act”,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selling weapons to Taiwan on the grounds of concern for Taiwan security. So far,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a lot of interpretations on these contradictions, but only failed to make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d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n fact, the d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will lead to the duality (internal tens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ctors, which can be verified by the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 current US-Taiwan relations. Eventually, it is under the US-Soviet structure that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China came into being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World War II, whereas the current US-Taiwan relation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d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duality, China-US relations, US-Taiwan relations